

中国社会转型期贫困问题的基本特征

吴忠民教授

在现阶段，伴随着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贫困群体，而且这一群体有增大的趋势。

中国城镇贫困群体的成员主要包括：失业人员与下岗职工（准失业职工），效益欠佳企业的职工，许多退休者，低收入或无劳动收入的残疾人和长期患病者，孤儿，未参加社会保险又无其他收入的鳏寡老人。从比重上看，在中国城镇贫困群体队伍中，是以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和效益欠佳企业的职工及其所赡养的人口占据主导位置。这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贫困群体的情形大不相同。

中国农村贫困群体的成员主要包括：低收入的劳动者，低收入或无劳动收入的残疾人和长期患病者，孤儿，未参加社会保险又无其他收入的鳏寡老人。

目前中国贫困群体中最具有代表性者，是城镇的失业者、下岗职工以及农村里的绝对贫困人口。中国社会目前贫

困人口总数约在 2 亿人以上。

与先发国家和其他的后发国家与地区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很不相同。中国社会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两种转型，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且，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庞大的社会机体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了更多的变项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艰难而复杂的社会转型背景，造成了中国现阶段贫困群体如下的一些特征：

1. 同时经受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

一般来说，在经济水准比较落后的国家与地区，贫困问题多体现在绝对贫困方面；在经济水准比较高的国家与地区，贫困问题则多体现在相对贫困方面。1978 以前，中国的社会成员处在一种“皆贫”的状态之中。在当时，经济十分落后，这就不可能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摆脱绝对贫困的状态；而计划经济体制与极

“左”思潮的合二为一，又使得中国社会成员的收入与消费水准呈现出一种“整齐划一”的情形。于是，整个中国社会便表现为平均化的绝对贫困，就总体而言，相对贫困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1，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只有0.16。¹

而中国现阶段的贫困问题迥异于上述国家与地区以及1978年以前的中国。目前中国既存在着一个较为庞大的绝对贫困者队伍，同时也存在着人数日益增大的相对贫困者队伍。尽管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综合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绝对贫困的总人数明显减少，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水准以及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尚属世界落后国家之列，而且，中国的东部与中西部区域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再者，虽然中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但是，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处在初步发育的阶段，远远谈不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夹生现象，这也就使得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分化有余而整合

不足的状态。经济水准的落后和区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必定会保留许多绝对贫困现象，而社会的非整合性，则必然会导致经济与社会资源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并进而造成庞大的相对贫困者队伍和一些新的绝对贫困者。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相对来说，近年来，中国由于农村的贫困问题比较受重视，扶贫工作做得相对比较好，因而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就总体而言有下降的趋势。城镇的贫困问题则大不一样。近年来，中国城镇的绝对贫困人数和相对贫困人数均呈明显的上升势头。

2. 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并表现出一种“晕轮效应”（放大效应）

相对贫困与相对剥夺感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在相对贫困的基础之上势必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则会强化人们对于相对贫困的感受。具体到当今中国社会，中国贫困群体有着一一种比较深切的相对剥夺意识，涉面比较广泛，而且，具有相对剥夺感的人数往往超过了实际的相对贫困人数，相对剥夺感表现出一种晕轮效应。尤其是在城市，这种情形更为明显。1997年，在一项对全国53个城市2430户城镇居民“改

¹ 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革形势与社会心理”定期问卷抽样调查中，在公众对 1992 年以来个人家庭生活的主观感受方面，有 36.8% 的人认为家庭储蓄有所下降，有 25.8% 的人认为家庭收入有所减少，有 27.5% 的人认为家庭生活水平有所下降。²显然，这种感受同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准之间是有差距的。另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相对剥夺感最为强烈的是城镇几大主要职业群体：专业人员、国家一般干部、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³

造成上述情形的主要原因是：其一，计划经济体制的深远影响。中国曾经长时期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严重。在城镇，国家和单位对于职工的工作、生活几乎是一手包揽。如，单位往往具有一种准家族的色彩，单位对于职工所负的责任、承担的义务过全，似乎是一个融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大宗族。从幼儿入托，少儿入学，子女就业，到养老；从住房，医疗，到婚丧，几乎是无所不包。随着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推进，以往的那种“福利”体系在逐渐地趋于瓦解，但新的社会保

障制度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许多社会成员尤其是城镇的职工往往缺乏一种自我生存意识与能力，缺乏一种竞争的意识与能力。因此，中国的社会成员对于相对贫困的感受尤为深切。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许多社会成员尤其是相对贫困者尚未充分享受到刚刚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喜悦，便已开始感到了相对贫困之苦。其二，民众社会生活层面上世俗化进程的过速推进。1978 年以前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受极左思潮以及禁欲主义的影响，民众的基本生活一直处在一种很低的水准。按可比价格计算，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以 1952 年为 100，到 1978 年仅增至 177。近 20 年来，民众越来越注重日常生活，其消费水平也得以大幅度的提高。从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来看，已改变了以往那种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而代之以务实性的态度。但由于以前民众消费受压抑的时间过长、程度过深，因而人们在挣脱束缚之后出现了反弹冲动过度的现象，即：人们往往是过于看重消费。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对于事关基本生计的事情难免特别的敏感，对于相对贫困的感受也就难免特别的深

² 汝信等：《1998：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 154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³ 罗桂芬等：《社会心理承受力的深层分析》，《社会学研究》1994 年第 4 期。

切。其三，社会焦虑。社会焦虑是指在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1979年以来的20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幅度之大、涉面之广，在这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这种变化的势头与速率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将持续保持下去。社会巨大的、急剧的变动，意味着社会成员原来所熟悉的社会环境大规模、急剧的变动。对于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社会成员往往存在着一个抗拒、逐步认可、认同的复杂不安的心理历程。再者，伴随着开放进程的推进，国外发达国家在一个较高的经济水准上对于中国社会产生着示范效应，使得中国的大量社会成员容易形成一种高期望值。但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这种高期望值难以兑现。凡此种种，使中国不少社会成员出现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人们往往无法预料自己将来的具体处境，对于未来往往容易怀有某种惧怕的心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对于不利于自己正常生活状态的事情，是极为敏感的。相应地，社会成员对于相对贫困问题的感受自然也就特别敏感和深切了，从而造成相对贫困问题的晕轮效应。

3. 得到多种因素的支撑

在现阶段，中国的贫困群体还无法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支撑。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的着重点是在退休职工的养老以及在职职工的福利方面，而失业保险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最薄弱的部位。因此，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有效地保证庞大的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虽然如此，但是，中国的贫困群体仍然得到了其他一些因素的明显支撑。

政府对于贫困群体的支撑作用最为明显。从目前中国的政府、社会、个人这三级层面来看，社会层面较弱。就现代社会而言，一般是“大社会、小政府”，贫困问题在不小的程度上是靠社会予以解决或缓解的。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较低，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大政府、小社会”或“强政府、弱社会”的情形。这样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的现实生活里，实际上只存在着政府与个人这样“两极”层面，政府与个人各为一极，而缺乏健全的“社会层面”如第三部门。而中国的历史传统及社会制度，

使得政府对于民众几乎负有无限的责任，政府一直极为重视扶贫与缓贫的事情。因此，在中国，对于贫困者的救助带有十足的“政府行为”的色彩。应当承认，在特定的时期，政府有关扶贫与缓贫的行为是比较有效的。比如，近年来，中国农村中绝对贫困的人数迅速减少，主要便是受益于政府有力的反贫举措。而目前诸如下岗工人的再就业、贫困者基本生活费的保障等问题，几乎都是靠政府出面予以解决的。

人伦关系对于贫困群体也有着一定的支撑作用。受民族传统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是一个人伦型的社会。亲友之间的相互帮助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当一方亲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据上海的一项调查，在所问的 294 名下岗职工中，有 173 名回答说其家庭目前生活主要来源是依靠配偶的收入，有 47 名回答说依靠父母、子女、亲友的接济。另据某省的部门调查，停产企业中有 20% 的职工靠亲友接济。⁴

还有一项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因素，这就是劳动者负担系数的降低。由于计

划生育政策的行之有效，近 20 年来中国的劳动者负担系数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无疑是已提前释放了如今贫困群体所面临的一部分压力。每一农村劳动力负担人数，1978 年为 2.53，1980 年为 2.26，1985 年为 1.74，1990 年为 1.64，1996 年为 1.55，2001 年为 1.52。每一城镇就业者负担人数，1978 年为 2.06，1980 年为 1.77，1985 年为 1.81，1990 年为 1.77，1996 年为 1.72，2001 年为 1.88。不应低估劳动者负担人数同贫困问题之间的密切相关性。如，2001 年，中国城镇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困难户为 2.35，最低收入户为 2.28，低收入户为 2.09，中等收入户为 1.86，高收入户为 1.71。⁵显然，在劳动者收入大致差不多的情形下，劳动者的负担人数状况便成为影响家庭基本收入的一个重要变项因素。假如中国劳动者的负担人数系数一直居高不下的话，那么，中国目前的贫困群体队伍要更为庞大，而且，绝对贫困者的处境也要更为艰难。

4. 整合性较弱

⁴ 陈学明：《社会转型期的困惑——上海部分下岗、在职职工心态调查》，《探索与争鸣》1997 年第 1 期；樊平：《中国城镇的低收入群体》，《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4 期。

⁵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91、297 页；《中国统计年鉴 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2、321、324 页。

中国城镇贫困群体成员从行业上看，多来源于纺织、煤炭、森林工业、军工的部分亏损双停企业以及部分地区的政府机关；从地域上看，多在内地地区、三线地区、计划体制控制严格的矿产和制造业产地；从文化素质上看，主要是由较低文化素质的职工构成。⁶

从理论上讲，城镇贫困群体成员由于文化素质较低，因而其从众心理较强；又由于行业、地域的相对集中，因而便于交流与相互感染；这一切，再加上其艰难的生活处境，城镇贫困群体成员很容易形成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并进而演化成激烈的集体行为。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城镇贫困群体成员虽然具有相同的意识，但就总体而言其整合性较弱，群体行为很难达到激烈的程度。

中国城镇贫困群体成员的整合性之所以较弱，主要原因在于这一群体的稳定性较弱，流动性较强。比如，作为城镇贫困群体中最重要组成部分的下岗工人，其进一步的去向往往是再就业。

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群体成员，由于居住区域的相对分散以及生产活动的

相对封闭，因而其群体的整合程度不可能很强，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也不可能采取过激的群体行动。

⁶ 樊平：《中国城镇的低收入群体》，《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